

周而復文集 ●

南京的陷落

南京的陷落

周而复 文集 ⑧

南京的陷落

长城万里图·之一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城万里图. 1, 南京的陷落/周而复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5

(周而复文集·第8卷)

ISBN 7-5039-2522-1

I. 长…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7790 号

南京的陷落(《长城万里图》之一)

周而复文集 (第8卷)

著 者 周而复

责任编辑 蒋爱虹

装帧设计 怀 一 宝 华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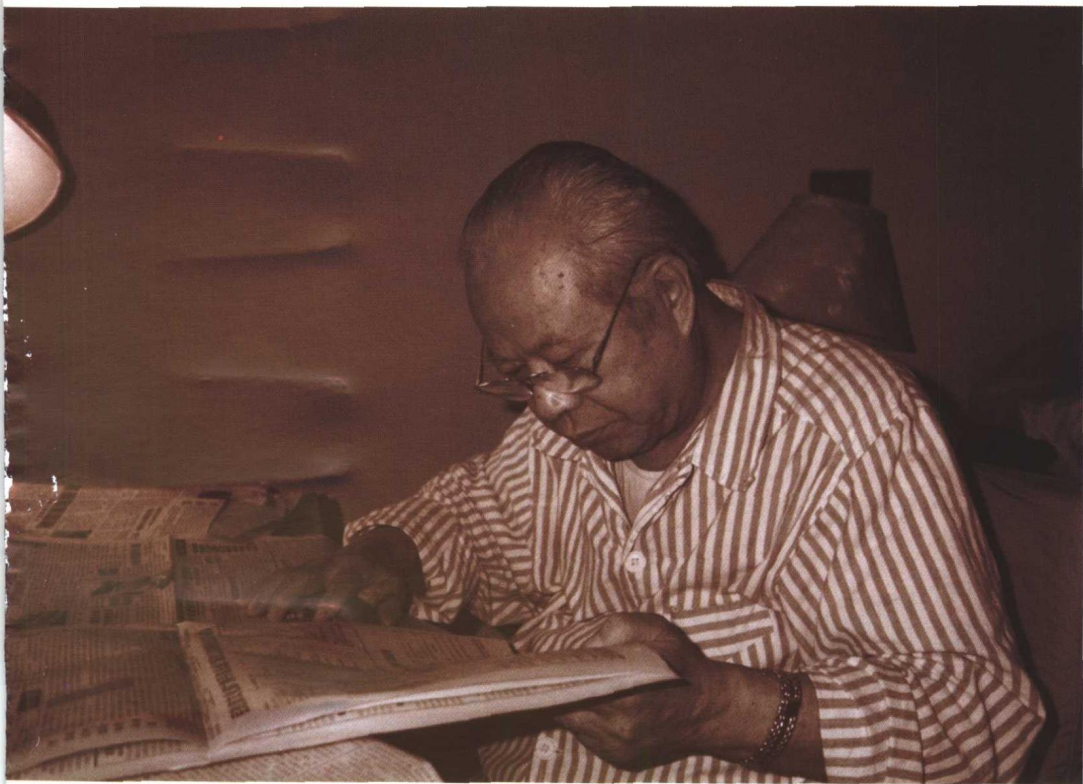
印 张 20.125

字 数 570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522-1/I·1180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周而复在医院，摄于1998年8月

前 言

—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即一九三九年秋天，我被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总政治部派赴华北敌后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的干部队，越过敌伪重重封锁线，一天一夜走了二百多里路，到了聂荣臻司令员领导的晋察冀军区。我先以第五文艺小组组长身份，也就是作家的身份，在军区和聂荣臻司令员一同进行“反扫荡”；后又到所属各军分区与军分区司令员以及团、营、连指战员一起行动，参加战斗，还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一九四二年冬天回到延安，才脱下八路军的军装，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从事创作。

在敌后时期，我就酝酿写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当时把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写满了十多个记录本，发表了一些战地的短小报告文学。在延安，写了《诺尔曼·白求恩片断》、《海上的遭遇》，秧歌剧《牛永贵受伤》和五幕话剧《子弟兵》，以及短篇小说等作品，时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准备继续写下去。一九四四年冬天，周恩来同志约我到杨家岭他的住处谈话，组织上准备派我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提任何意见。到了重庆，主要参与党的机关杂志《群众》半月刊工作，也参加一些文化界和统战方面的工作，有机会直接或间接接触不少著名人士，如宋庆龄、冯玉祥、蒋介石、何应钦、张治中、沈钧儒、黄炎培等。八年抗战迎来了胜利，举国欢腾，但是内战的乌云笼罩着中国的天空，国民党反动当局和蒋介石磨刀霍

霍，准备包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并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

以马歇尔为美国代表，以张治中和周恩来将军分别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参加国共两党军事调处，我作为新华社和《新华日报》特派员，随三位将军采访军事调处的新闻，和有关省市国共两党高级军政要员接触。军事调处失败，国民党赢得时间调兵遣将，做好内战准备，大规模向解放区进攻了。

周恩来同志当时在南京梅园新村和上海马斯南路代表中共和国民党谈判。他见内战危机逼近，将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大部分送回解放区，一部分派到香港工作（我是其中之一），只留少数人坚持工作。在香港，我参加香港工委的文化和统战工作，有机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接触，如李济深、沈钧儒、柳亚子、黄炎培、沈志远、郭沫若、茅盾、千家驹、洪深等。工作之外，我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即《白求恩大夫》、《燕宿崖》和《西流水的孩子们》，都是描写晋察冀敌后八路军和群众英勇艰苦斗争的故事。我写这些作品，可以说，都是为了反映八年抗日战争系列长篇小说做准备工作。

上海解放以后，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工作，更多地直接接触和联系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物和无党派的高级民主人士，根据中央指示，和他们商谈前往北平参加建立新中国事项。繁忙的统一战线工作使我放下了笔，连读古典文学作品的时间也少了。一九五一年“三反”运动开始了，接着是“五反”运动，“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其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在市委和陈毅同志领导下，我都参与其事。

在世界上，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列宁曾经想以“赎买”政策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受到帝国主义国家包围，没有实现。我于是开始写《上海的早晨》，把抗日战争系列长篇小说写作计划暂时放下了。没料到这个“暂时”竟延续了二十七年之久，其中包括“十年浩劫”，我失去了七年自由。一九七六年地震以后，我在汉口一位朋友的家里续写《上海的早晨》，当年十一月在广州写完第四部二稿的最后一行。

二

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我翻阅在“十年浩劫”当中幸存下来的抗战时期记录创作素材的本子，阅读了一些与抗战有关的资料，决定以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为主，从敌后来反映八年抗战，取名《搏斗》，写了提纲，计划写五部。第三部初稿写出，我把第一部初稿请适夷兄看，想听听他的意见再修改。他很快看完了，说书中有些故事别的作家已经写过了，你何必再写？他几句话“枪毙”了第一部初稿，实际上把百万字的三部初稿都“枪毙”了（他不知道我已写出第二、第三部）。二十七年间，我所知道的某些素材，别的作家也知道并且先我写出，我事先并不知道，因为忙于统战、宣传和外事工作，看的抗战题材的作品很少；而适夷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当然知道作品题材发表和出版的情况。他又说，你的生活经历比一般作家丰富得多，可以全面地写八年抗战，这题材至今还没有一位作家写过。他这几句话，孕育了一个文学的婴儿。我反复看了记录前方、敌后和大后方创作素材的本子，看了一亿字左右的档案、文献和资料，构思不断发展，认为从一个地区或者一个侧面和一个战斗战役不能反映八年抗日战争，从基层群众或中层干部官兵也不能全面反映八年抗日战争，必须比较全面地从上层领导人物来写。于是，我另起炉灶，进一步搜集材料，访问抗战时期重要人物，在国内注意参观访问有关抗日战争的场所，包括重要人物的活动场所；出国访问日本、苏联、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瑞典、瑞士、印度、缅甸、印尼等国的时候，我特地参观有关战争的地方和单位，在可能范围内，向有关人士访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关亚洲战场和欧洲战场的一些情况，不断收集素材，加以补充。我给这个婴儿取了个名字：《长城万里图》。

在构思时，首先碰到一个问题是怎样认识抗日战争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过去流行两种看法：一是国民党认为抗日战争是国民党和蒋委员长（介石）领导全国军民取得胜利的，根本不提共产党毛泽东主席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特别是在敌后战场上的丰功伟绩。这当然是错误的，歪曲和篡改了历史。二是认为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所取得的胜利，不提国民党和中央军。这当然也不全面。

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怎么办？惟一正确的办法是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作家应该根据历史的真实创作，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别无选择。正如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总序里所说的那样：“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我也只能当抗日战争八年历史的书记，不能根据有偏见的或者不全面的观点去反映这段史实。我必须尊重历史。当然，在开始创作这部系列长篇小说年代，以这种观点去创作，是有危险性的，会遭到美化国民党和中央军以及降低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丰功伟绩的批判。在创作《上海的早晨》的时候，因为我写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积极与消极），反革命“四人帮”钦赐为“大毒草”：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批判十年之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尊重历史真实写出八年抗战，会不会遭到与《上海的早晨》同样的命运呢？反革命“四人帮”已扫进历史垃圾堆，应该说这种危险性没有了，但极“左”思想的影响存在，也不能说绝无风险。我是冒着风险毫无畏惧地去写，拟出创作提纲和重要人物小传后开始动笔，一九八二年写出第一部《南京的陷落》初稿。

三

为什么要冒风险去写这部长篇小说呢？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近百年来，中国遭受外敌侵略，总是失败，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告终。惟有这次抗日战争，以日本无条件投降告终，是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大半个中国一度沦于敌手，两千万以上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抗战中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次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举洗雪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抗日力量，当时抗击和牵制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做出了伟大贡献。抗日战争光照历史，应该大书特书。

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只是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的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中最先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应当作为第二次大战的起点。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签订三国同盟协定。意大利不堪一击，一九四三年九月就无条件投降了，坚持侵略的主要是德国和日本。德国进攻苏联以后，曾经希望日本“北进”，同时夹攻苏联。日本和苏联虽然签订了“中立协定”，但日本不是不想进攻苏联，一九三八年八月就制造了“张鼓峰事件”，遭到苏军打击，才不得不停战。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战略物资库存日益减少，如石油这个战争的血液只够一年消耗，军部方面如东条英机等主张南进，攫取南洋一带石油、橡胶和锡等，充实军备。而北进，就得不到这些军需物资。日本打的如意算盘是：等德国将要完全击败苏联时，他再出兵北进，共分“胜利果实”。

日本和德国已决定瓜分世界范围，并且明目张胆地规定日本作战掠夺地区是东经 70° 以东到美洲西海岸及这一海面的大陆和岛屿（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德国作战和掠夺地区是东经 70° 以西到美洲东海岸及这一海面的大陆和岛屿（包括非洲等）。如果一旦梦想实现，全世界只剩下两个国家：德国和日本。然后是德国与日本争夺世界霸权，进行最后一次战争，不是德国打败日本，便是日本战胜德国，剩下一个国家统治全世界！多么可怕梦想！梦想毕竟是梦想。在欧洲战场上，以苏联为首的主力打败了德国。在亚洲战场上，以中国为主的力量，得到苏联、

美国和英国等国军事力量的支援，打败了日本。这对于世界历史的意义是何等重大！如果不是中国武装力量打击和牵制日本百万以上的侵略军和百万左右的战略预备队关东军，日军就可以提前南进，亚洲和美洲地图就可能要改变颜色。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贡献，往往被人们忽视，必须给予应有的高度评价。我创作《长城万里图》，就是为了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和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历史的真实，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国和世界近代史的伟大转折点，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兴起，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有着伟大的历史功勋！但是，法西斯余孽和少数别有用心野心家不是这样看。他们梦想颠倒是非，篡改历史，隐瞒真相。例如一九八二年在日本曾经发生“教科书问题”，将日军侵略别国，叫做“进入”；将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炮制伪“满洲国”，改为通过提倡日、汉、满、蒙、朝“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将日本为扩大侵略战争，蓄意挑起的“卢沟桥事件”，说成是“蒋介石发布总动员令，共产军也参加了战争”，日本是被迫应战的，使“战线扩大到中国全境”；对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不提大屠杀事实，却说需要进一步调查真相；将日军袭击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歪曲为“日本当时把这场战争定名为‘大东亚战争’（所谓太平洋战争），认为其目的是从欧美列强统治下解放亚洲，并在日本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凡此等等，不过是要把日本侵略战争的铁的史实掩盖起来。这遭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等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才做了某些修改。

日本人民，包括曾经参加侵略中国的日本有了觉悟的官兵在内，不是这样看法。他们承认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并且行诸文字，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原《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出版了《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南京大屠杀……），由世界知识出版社翻译出版，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欢迎。日本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也写入了“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与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日战争，在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既然有这样伟大的历史意义，炎黄子孙，尤其是青少年都应牢记这段历史。中国作家责无旁贷地需要全面反映和描写这段历史。这是中国作家，特别是老一代作家的神圣职责。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把反映抗日战争伟大历史真实的作品献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我不怕冒任何风险。

敢于冒这种风险，我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它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

我于一九八二年写出《南京的陷落》初稿，一九八五年在《当代》双月刊发表部分章节，不久单行本问世。一九八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发了个文件，大意是国共两党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群众，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海外侨胞在内，凡是英勇抗日的将领和士兵（包括国民党中央军在内）都应该表扬和肯定；这次战争还得到国际上民主和进步力量的支援（指苏联、美国、英国等盟邦），共同战斗，打败日本法西斯……我冒的风险，这时才有了保障。但它却联系到另外一个重大问题。

四

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反法西斯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只写中日之间的战争，当然是不够的。我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反映以中日双方为主的亚洲战场，同时又要和欧洲战场有一定的有机内在联系。

反映这样错综复杂的千头万绪的历史，怎么结构呢？既不能主次不分，轻重颠倒，顾此失彼，也不能面面俱到，巨细不遗。如何建筑这座庞然大物的文学大厦？我花费了许多心血，有时甚至夜不成寐。

“历史要写的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千百万人的生活。然而……为了这需要描写许多东西，要有生活全部的详情细节的知识，要有艺术——艺术才能，要有爱。此外，在最伟大的艺术里，还要写许许多多，才能使我们完完全全了解一个人。”（托尔斯泰：《谈〈安娜·卡列尼娜〉的结构》）抗日战争这段历史要写的也“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千百万人的生活”，怎么结构呢？正如冈察洛夫谈到“建筑一座小说大厦所需要的无形的然而巨大的劳动”时所说的那样：“单是一个结构，即大厦的构造，就足以耗尽作者的全部智力活动：思量和周密考虑参与主要任务的人物，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事件的安排和过程，人物的作用，还要留神地检查和批评有关真实不真实，欠缺或过分等等问题，总而言之——像喝干海水一样困难！”（冈察洛夫：《迟做总比不做好》）我虽然没有“像喝干海水一样困难”，但也一再思考各种各样的结构。构思了一个，推翻了，又想了一个结构，反反复复，花了许许多多时间。

按照小说已有的模式，以战争为背景，写一个人的遭遇和命运，或者一个家庭的遭遇和命运，这不能反映伟大的抗日战争。在抗战时期，个人和家庭的遭遇和命运已降为次要的地位。虽然千千万万的个人和家庭，不是流离失所，就是家破人亡，但全国各族人民所关心的不是个人和家庭的遭遇和命运，最关心的是祖国的遭遇和生死存亡的命运。大家惟一的希望和要求是：抗日救国，拯救濒于灭亡的祖国，即使个人和家庭都牺牲了也在所不惜。何况用单线的写法，不可能容纳这样巨大的历史内容。用复线的写法呢？比如《安娜·卡列尼娜》，以列文和吉蒂的线索同安娜·卡列尼娜和渥伦斯基的线索平行发展，可是只写中日双方的斗争，也无法反映历史的真实。就中国方面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国共两党和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和工农兵学商以及一切爱国同胞等；在敌人方面，日本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阁与大本营

之间的矛盾，敌伪力量的明争暗斗以及德、意、日之间又统一又矛盾；何况还要写到美国、苏联和英国等盟邦又统一又矛盾哩。形式服从内容。不能用一定的形式去反映和描绘任何内容。我于是采取多线索的写法，只有这样才能容纳巨大的历史内容。多线索的结构定下来了，有点像《三国演义》，但比《三国演义》更加复杂更加丰富，因为它不止“三国”，除中日两国以外，还有苏联、美国、英国等盟邦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

结构定下来了，怎么反映和描绘这样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巨大内容呢？

世界充满了矛盾，没有矛盾不成为世界。反映这样巨大内容的长篇小说，要善于抓住矛盾来写。由于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缓和与下降；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民党内部依然存在矛盾，四大家族蒋、宋、孔、陈的矛盾，国民党蒋介石与地方势力的矛盾，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阶级矛盾虽然缓和了下降了，但仍时起时伏，有时紧张，有时缓和；而共产党领导之间也并非没有矛盾。在欧洲战场，苏联和德国的矛盾，苏联和英国、美国又统一又矛盾。因此各种矛盾重重，又互有联系，抓住矛盾主要方面，便可以逐步展开小说的画面。

有位文学评论家问我，为什么这部长篇小说以汪精卫上庐山参加国事会议开始？“一个剧本的第一幕也许是最困难的一部分。要由它开端，要使它能以发展，有的时候要由它表明主题，而总要它承先启后。”（狄德罗：《论戏剧艺术》）长篇小说开头也是如此。抗日战争小说，主要写民族矛盾。庐山会议之际，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战与和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展示了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张群等对民族矛盾的态度，恰巧这时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也在庐山，准备与国民党谈判合作、共同抗日救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矛盾集中暴露，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集点。如何解决矛盾这是广大读者最关心的问题。这样，可以承先启后，逐步展开矛盾与各种线索，步步深入，从容去写，也表明了小说的主题。

五

怎样塑造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群众的领导人物形象？这也就是塑造典型人物的问题。

“为了塑造一个人物，往往必须掌握几个相似的人物。有句意大利谚语，把这种情形形容得真是入木三分：这条尾巴原来是另一只猫身上的。文学采用的也是绘画的方法，它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肩。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写变为真实。”（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初版序言》）福楼拜也有类似的意见：“必须永远把自己的人物提高到典型上去。伟大的天才与常人不同的特征即在于：他有综合和创造的能力：他能综合一系列人物的特性而创造某一种典型。”我写《上海的早晨》所塑造的人物，如徐义德、马慕韩、潘信诚、余静、梅佐贤、冯永祥、林宛芝、汤阿英等，就是采取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徐义德这个人物是综合概括若干工业资本家特性塑造出来的。其他的人物也是如此。因为用的假名假姓，允许把许多相同的人物的特性概括到一个人物身上去，使他成为一个真实的典型。

但是创作《长城万里图》，完全运用这样塑造人物的方法，却遇到一定的困难。第一，这部小说的主要上层领导人物都是真名真姓，不允许也不容易将相同的人物的特性情节综合概括到他或她的身上去；其次他们和她们的性格特征和言行，许多人都知道，并且在某些人当中有了深刻的印象，形成一定的看法；第三，开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书中上层领导人物有不少还活在世上，到现在也还有人生活在国内或者国外，至于他们和她们的亲属活着的更多。怎么塑造这些人所共知的上层领导人物？

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难关。怎么突破不可超越的难关？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指出：“刻画性格应如安排情节那样，求其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某种性格的人物说某一句话，做某一桩事，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一桩事件随另一桩事件而发生，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狄德罗在《论戏剧艺术》中指出：“莫里哀经常是无法模仿的。他写了一些四五个人同时吞吞吐吐地说话的场面，每个人只管说自己的，可是所说的话符合于他的性格，刻画了他的性格。”

我尽可能搜集与了解书中真名真姓上层人物的活动，每一个富有特性的细节也不放过，还注意这些人物的一言一行，特别是富有特性与个性的语言，让“所说的话符合于他的性格，刻画了他的性格”。重大事件都是有根据的，不允许有虚构部分，也不能把张三的事综合概括到李四身上。即使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虚构生活细节部分，也必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这样才能做到还人物以本来面目。当然比本人原型更集中更突出，因此，具有典型的意义。

关于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塑造，多年来，特别是反革命“四人帮”的御用文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正面人物必须是高、大、全，也就是完人，不能写他任何缺点和失误，否则就是丑化正面人物。而反面人物，一定是彻头彻尾坏到骨髓里去，不能写他任何一点好处，否则就是美化反面人物。我写《上海的早晨》中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内部）具有消极一面和积极一面，“四人帮”钦定为“美化资产阶级”，定为罪状之一。我写工人阶级余静和汤阿英的觉悟和成长过程，也被“四人帮”认为是“丑化工人阶级”。

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有自己成长的过程。正面人物不是天生的英雄好汉，反面人物也不是呱呱坠地一生一世都有恶行，都干坏事。正面人物不可能没有缺点与失误，而反面人物也不是一辈子一点好事也没有做。一个人的经历是复杂的，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下会有不同的遭遇和表现。基于这样的认识，《长城万里图》里的人物不论是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我都如实写他们。例如蒋介石这个人物，人们知道他是大独裁者，生

平防共反共，自称不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他死不瞑目。他曾经集中全国中央军兵力发动“剿共”，进行内战长达十年之久，在抗日战争中又掀起三次反共高潮，曾经消灭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可谓反动透顶了。但他又同意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进行抗日战争，淞沪之战、南京之役、台儿庄之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等等，都是他指挥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在武汉失守以前，国民党蒋介石是积极抗战的。代表中国出席开罗会议的，是蒋介石；争取苏联、美国和英国等援助，共同打败日本的也是蒋介石。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并且和日本勾勾搭搭，暗中议和，准备投降，这也是蒋介石。采取各种威胁利诱的方式方法，分化、收买、消灭地方势力，发展与巩固国民党统治的，不是别人，还是蒋介石。在个人生活上，他又与小学教员、护士等眉来眼去，暗渡陈仓，卿卿我我，温柔多情。他对宋美龄又恨又怕又不能离开……凡此等等，不胜枚举，不可能简单骂他一句，或者漫画化一下，就可以塑造出蒋介石的形象，否则难于解释他怎么能够统治中国二十二年之久。必须取其有特性的言行，集中如实描绘，才可能塑造出蒋介石之所以为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形象来。

反面人物汪精卫，举世皆知他是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大汉奸，其滔天罪恶，真是罄竹难书。但他一九〇五年七月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会所参加过同盟会筹备会，以后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中国同盟会总章》和《军政府宣言》，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汪精卫为评议部议长，汪精卫成为同盟会主要干部之一。青年汪精卫等谋刺摄政王被捕，写过悲壮的《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他对旧诗词有较深的造诣。他出任过广州国民政府主席等。他还表示过：“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总理所指示的“三条革命的路”。诸如此类言行，不能说不是进步的。他走上大汉奸的道路也有其发展的过程。当然，他当了汉奸以后，也就污染和自毁了其进步方面的历史。

解决如何刻画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以后，还有一个典型人物性格单一性的问题。吝啬的人总是吝啬，狡猾的人事事狡猾，致